

以产业生态模式助推 深圳科技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邱文

摘要：基于科技园区作为科技产业培育和企业创新发展的平台，文章介绍了中国目前科技园区的主要模式，并结合经济发展理论，重点阐述了深圳湾科技园区独特的产业生态发展模式，以及科技园区与湾区经济的关系。同时，对科技园区在科技产业创新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及今后进一步发挥更大价值提出了建议，并倡议大力支持产业生态模式科技园区发展，使之成为深圳今后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与路径。

关键词：科技园区；产业生态；资源配置；深圳；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1)03-0064-08

科技产业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令人心潮澎湃。当前，深圳乃至中国既面临时代的大变局，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之下，传统的应对之策已远远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而科技园区应该登上更重要的历史舞台。

一、我国科技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整的科技园区体系，至少没有产业生态模式、产业生态体系的科技园区。国外、境外的科技园区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及市场化主导两种，政府主导比较典型的是日本筑波科学城及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市场主导主要是市场化的产业地产模式。另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模式——新加坡模式，它是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的结合体，也是园区开发模式的典范，但因为新加坡地域面积实在太小，因此在生态运营方面存在局限性。

至于我国科技园区，虽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框架下，却最有机会探索建立园区产业生态体系，即开发运营产业生态模式的科技园区。

当前我国科技园区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

——政府及园区平台模式。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科技园区组织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大的类型：一是纯财政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在财力比较充裕的经济发达城市比较常见，政府为支持重点产业及企业发展，采取直接开发或购买优质产业载体资源的方式形成了部分纯财政投资园区；二是政府园区平台模式，最典型的是管委会+园区平台模式。纯财政投资园区实际上有悖于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原则，不能成为园区的主流，而应定位为支持特定产业、企业和机构；而且政府自身无法解决园区专业化运营服务的问题，因为政府所能

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企业所需的发展资源还不能划等号。而管委会+园区平台模式，也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是园区平台公司无一例外是国有地产公司或基础设施公司，但科技园区的本质不是地产；二是基于当地的资源局限，平台公司以及管委会都很难具备有效获取足够高端资源的条件。

——市场化模式。主要包括国企产业地产公司及民营产业地产公司。前者代表性园区包括中关村、上海张江以及各大央企在内地省市所做的产业地产项目等；后者有华夏幸福、大连亿达、联东集团、天安云谷等；还有一类混合所有制科技园区公司，包括深圳天安数码城、苏州工业区以及上市公司武汉高新等，这些园区的特点便是市场化、地产化，但地产化在商业模式方面与产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当前，随着政府对产业用地政策的收紧，传统的市场化产业地产模式普遍陷入了发展瓶颈，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模式破局，以及政府及时加以科学的政策引导，将直接影响我国科技园区的整体发展。

——深圳湾园区模式。深圳湾科技园区包括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深圳软件产业基地、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等七个园区，均位于深圳核心创新区——深圳高新区。园区建筑面积360万平方米，入驻创新企业已超过1000家，既包括华为、腾讯、空客、西门子等世界顶级企业的重要机构和以顺丰为代表的52家上市公司；也包括众多极具特色的深圳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园区企业年总产值超过2500亿元。深圳湾科技园区是2015年深圳首届国际创客周及全国首届“双创周”深圳分会场以及2016年全国“双创周”主会场。“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成为代表中国创新创业最高水准的佳话。深圳湾科技园区以国企独立开发、市场化运营为特色，是一个全新的科技园区组织模式，打造了全新的科技园区开发运营模式——产业生态模式。通过构建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及产业资源平台，使园区企业的发展得到最充分、最便利和最高效的资源支撑，形成了以产业资源高效配置为核心的园区发展模式。

二、深圳湾科技园区产业生态模式的探索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深圳湾科技园区已

经构建起形态基本完整的园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一）重点产业子系统。这是园区生态的核心资源。在深圳湾园区，深圳湾科技将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大中小企业及上下游环节进行合理布局，整合产业资源，强化协同协作。一方面，园区的世界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以市场和资源优势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并支持龙头企业依托园区资源构建自身产业生态；另一方面，园区中小企业可依托龙头企业拓展业务发展机会，孵化器、加速器又源源不断地为园区培育具有创新活力的小微企业。通过园区产业协同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2019年底，华为鲲鹏产业源头创新中心落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并与深圳湾科技共同运营。一年半以来，园区生态运营为华为鲲鹏生态发展重点生态伙伴近300家，得到了华为的高度认可，同时还为深圳引进了鲲鹏产业链重点的数据库、操作系统等骨干企业20多家，夯实了深圳的鲲鹏产业基础。

（二）三大配套子系统。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全方位的优质外部资源支持。园区平台积极为园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高品质配套资源。包括：建立专业服务子系统，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获取高端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等资源的能力不足问题；建立公共服务系统，与南山区政府合作，打造园区专属的党群建设、行政审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社康、托幼等公共服务机构，将公共服务送到企业和员工身边；建立商务配套系统，为园区企业降低营商成本，并与市消委会共建“品质消费示范基地”，使园区再小的企业以及普通员工，都能在机票酒店、电商平台、用车出行、园区商业等方面享受世界500强企业级别的高品质和低价格。

为给园区企业发展带来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最大化提升园区平台价值，在市国资委和深投控指导支持下，园区运营公司——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湾科技”）对自身转型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方向和目标：

（一）转型成为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传统科技园区属于产业地产行业，但深圳湾科技从两个方向探索转型为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一是充分

利用核心园区产业资源优势,以线上资源服务平台——MyBay为核心,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整合服务,使园区企业成长的速度更快,成功的概率更高;二是充分发挥深圳湾核心园区实践优势,变身为科技园区行业的专业顾问咨询机构,从项目规划、产业定位、开发建设、运营管理、资源导入等方面为深圳及内地省市提供全方位、全链条顾问咨询服务,并已在浙江、山东、四川等地实现项目落地,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评价。对外部重点园区项目,深圳湾科技提供顾问咨询和合作运营服务,为两地入园企业共享两地园区平台资源,并按照产业生态模式和标准提供一揽子专业招商运营服务。通过转型升级,最终使深圳湾科技成为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关于高端服务业属性定位和要求的专业服务机构。

(二) 打造引领型产业资源平台。深圳湾核心园区目前拥有超过1000家创新企业及超过15万名高端员工,也基本构建起产业生态系统。但要成为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园区资源平台的规模还需进一步壮大。按照规划,深圳湾科技园区资源平台将通过品牌输出、园区协同及核心战略合作伙伴生态体系融合等方式,将园区资源平台规模在现有基础上迅速扩大到超过10万家创新企业及超过1000万名高端员工,既成为独特的产业资源集聚平台和商业模式创新平台,又成为代表支撑、推动中国科技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三) 实现园区资源的价值再造。参与园区产业生态系统的各方,包括企业、机构、员工等等,其本身即具备相应的价值。但产业生态模式下的科技园区平台,其使命是使参与各方实现资源价值的更大化,甚至是实现几何式增长的价值。园区企业得到园区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支持而发展得又快又好;园区专业服务机构依托园区拓展新的服务模式(比如批量拓展传统模式难以触及的中小企业客户资源);园区企业员工依托园区得到更广泛的职业发展空间,享受随处可得的优质优质服务。总之,深圳湾园区将使园区物理平

台变成一个入园企业和员工共享的价值创造平台。

三、产业生态园区模式的理论基础

深圳湾科技园区的实践来源于深圳国有科技园区的“圈层梯度、一区多园”基本战略,园区运营的产业生态商业模式也是基于相关理论的创新探索。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一) 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但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萌发和发展的。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俯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提出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各种发展战略。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并非来自于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模仿或趋同,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一事实促使发展经济学开始真正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在科技园区的创新发展模式之中,一方面要吸收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有益理论,另一方面,也应该大胆探索、构建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在一定的阶段,经济发展不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这对于科技园区来说,就需要既学习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又勇于突破既有的思维,进行新的探索,并以产业生态新模式去验证新的理论。

(二) 圈层结构理论。圈层结构理论是深圳国有科技园区“一区多园”战略的基础理论支撑之一。其主要观点是,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与空间距离成反比,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为中心,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展。圈层理论总结了城市扩张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发展城市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①

^① 圈层结构理论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

深圳国有科技园区“一区多园”战略依托圈层结构理论,认为深圳这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城市同样需要形成城市圈层发展格局。但科技园区的圈层布局有区别于城市大圈层的特点。在科技园区布局方面,首先是确定深圳湾七大园区为核心圈层,但这个圈层不是以第三产业为重点,而是以高端科技产业资源为中心。在核心圈层外围的深圳其他各区规划为基石圈层;在深圳的外围,即珠三角地区,规划为卫星圈层,体现为核心圈层及基石圈层产业协同及生产制造配套。“一区多园”的圈层结构虽然与城市整体的圈层结构有所不同,但逻辑关系是一致的。

(三)梯度理论。梯度理论是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开发中,按照各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期逐步开发的理论,为制定国家或区域经济开发战略的基本理论之一。区域经济发展应承认历史形成的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加速转移,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只对技术梯度(产业梯度)进行分析,并没有提出各梯度之间的协作关系解决方案。深圳国有科技园区“一区多园”在梯度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梯度协同的理念。即“一区多园”的多梯度布局是基于不同技术梯度地区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协作关系的构建而形成的。这也使深圳国有园区“一区多园”在圈层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面向内地省市园区的“辐射圈层”和面向国外科技产业高地的“创新圈层”。前者在基石圈层和卫星圈层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链下游协同和区域市场布局来进一步完善以深圳高端产业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不仅为深圳创新发展服务,同时也帮助内地省市与深圳形成良性产业协同关系,并共享深圳创新资源,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后者主要是通过持续引进全球创新资源,支持深圳科技产业不断创新,不断建立新行业、新企业,创造新产品,以持续维持深圳朝更高阶的创新发展。

(四)熊彼特创新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

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熊彼特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情况,即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科技园区所建立的创新生态体系,实际上就是这样—个具体体现。我们所倡导的“圈层梯度、一区多园”,其中的经济圈层和产业梯度,体现的就是“新经济”与“旧经济”的融合发展。为实现这种融合发展,我们通过科技园区构建完整的“创新链”。在科技园区,这五种创新中,前两种以园区企业为主,但园区平台可以为园区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好的资源条件;后三种园区平台可以以园区产业生态对企业的创新给予园区企业自身可能难以达到的资源获取能力,这也就是园区平台的创新能力。

(五)熵增定律。熵增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最早在1850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指自然社会任何时候都是由高温自动向低温转移的,它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最终会达到热平衡,没有了温差,也再不能做功,这个过程就叫熵增。最后的状态就是熵死。熵增定律从开始的物理学范畴,到后来各领域的延伸应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重视。

对一个孤立的、不在一个产业生态园区的企业来说,除了像华为这样极度自律的企业,一般企业其实很难摆脱熵增的规律。没有外力做功,自己又没有能力或自律来,那结果就只有熵死。但在生态科技园区的企业,园区平台会推动企业主动做功。如果企业是自律的,企业在生态系统中就会提升;如果企业是松散的,企业会退步。而企业在自身的孤立系统中往往无法感觉到这种变化。而等到由量变转为质变时,为时已晚。而且,在园区生态环境下,企业会有大量学习先进的机会和条件,来提示、帮助自己主动做功,因为园区平台可以成为企业的源头活水,来帮助企业避免熵增、实现熵减。

四、科技园区与湾区经济的关系

纵观世界三大知名湾区(纽约、旧金山、东京),

湾区早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研究分析湾区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科技园区具有重要意义。湾区经济大都会经历五个产业发展阶段:

——港口、贸易阶段。湾区经济的形成与海洋及港口密不可分。各国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便利及低成本的海运物流,这是市场所决定的规律,也是非常难打破的规律。如果一定要打破这个规律,则必然与科技园区相关。

——生产加工阶段。因为航运与贸易的高度发展,会使越来越多的加工生产集聚在港口周边地区。依托于海洋贸易,纽约本土制造业在19世纪初开始发展,至1860年,纽约制造业产值已攀升为全美国第一,成为美国制造业中心。而粤港澳大湾区,则从改革开放之后,依托香港及全球产业转移,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科技产业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湾区能源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大量淘汰或者向远郊迁移,并利用纽约市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减免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吸引科技创新型企业到纽约发展。同时利用纽约市及都市圈内大学、研究机构众多的优势,研究和开发高科技产品,适应后工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东京湾区也同样经历了从初级生产加工到重化工业再到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过程。不过,科技产业虽然具备一定的科技含量和技术门槛,但往往不具有原创技术和核心技术。

——金融、现代服务业阶段。金融业是纽约湾区的核心产业,创造了最大的附加值,也是纽约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基础,同时形成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核心,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美国七家大银行中的六家,以及2,900多家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构。正是因为金融业对实体产业的控制能力及高附加值能力,使得金融及现代服务业在产业发展阶段上高于一般的科技产业。

——创新经济阶段。对创新经济来说,核心竞争力就是基础原创技术。比如,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高端设备、材料、制造工艺、工业软件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就构建了创新经济。因为事实上的行业垄断,这类实业行业的利润率甚至可能超过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此外,商业模式创新也是创新经济的核心内容,比如苹果创造的智能手机由卖产品转向卖服务的全新商业模式。从目前来看,中国产业生态模式的科技园区可能会创造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归纳湾区经济优势,无外乎两点:一是产业资源高度集聚;二是产业资源高效配置。前者是基于湾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及长期的产业积累而成,而且这种高度集聚是难以模仿的。从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化就是规律。比如美国产业集中在东、西海岸;中国产业集中在东部沿海,都与“海”密切相关,而且集聚的趋势还在加大。后者是基于湾区产业资源的高度集聚,因此具备高效配置的条件。比如说珠三角对智能硬件制造行业来说,一个企业所需的方案、设计、加工、零部件配套、物流、贸易等全流程、全环节资源,都可以在两小时车程内轻松实现,这就叫资源的高度集聚和高效配置。

针对湾区经济的两大核心优势可以发现,科技园区应是湾区经济优势的核心体现。因为,即使在产业资源高度集聚的湾区中,还有一个产业资源更集聚的存在——科技园区,没有载体及区域比科技园区更能集聚产业资源。但另一方面,科技园区能否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却不是完全自然形成的。高效配置依托传统的市场机制其实并不能达到价值最大化的效果,因为传统的市场机制可能失灵。比如我们居住的社区,大家发现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小区看似是人的高度集聚,但相比原来的四合院邻居可能更加老死不相往来,而不相往来的结果就是资源无法高效配置。

因此,要让产业资源集聚的科技园区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需要专业运营来实现价值。这种专业运营,就是按照产业生态系统的要求主动构建园区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同协作关系,并以这种创新的资源整合方式来实现、体现、提升湾

区经济的核心优势。

五、大力支持产业生态模式科技园区发展

(一) 需要共同认识时代的潮流。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变革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一般企业来说,这将是一个接受考验的时代。单个企业其视野会有局限性,而且思维容易被传统行业的经营带入惯性的轨道,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落后。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一般企业很难独自应对。因此,作为企业,需要及时看到社会及产业变革的趋势,并积极寻找应对与发展的路径。毫无疑问,产业生态模式的科技园区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平台。园区平台既是资源平台,又是信息平台,还是价值优化的多维平台,它的丰富性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跨界要求非常契合,加入园区生态系统,是自我赋能的一条捷径。而科技园区,则需要以完善的产业生态及越来越强的生态服务能力来吸引优质企业加入园区产业生态。同时,在当前阶段的经济对抗中,也需要科技园区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更高的竞争力,因此,科技园区需要国家给予更大的关注与支持,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需要共同形成创新的园区路径。在宏观层面尚未对科技园区给予战略性定位,所以当前政府关于科技园区的政策,一方面未完全将科技园区政策纳入产业政策的统一体系,相互的衔接、融合不够紧密,不利于实现产业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对科技园区的属性及发展模式还比较模糊,不利于科技园区发挥最大价值。新加坡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模板。新加坡模式既不是公共产品模式,也不是产业地产模式,而是政府主导、政府支持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政府主导是指规划主导,将科技园区规划提升到与产业规划同等重要的高度;政府支持是指土地支持与园区配套资源支持。在政府主导、政府支持的基础上,新加坡园区的具体开发运营又以市场化运作为基本原则。虽然是以新加坡国有企业园区公司为主体承担开发任务,但新加坡国有企业均采用纯市场化机制,不存在财政投资、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化行为,园区物业的租售价格也采取完全市场化的价格。

(三) 需要共同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当前科技园区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是不同属性产业用房差异化的租售价格体系及资源配置对园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以租赁价格为例,在国有园区、国企园区、民营园区共存的情况下,不同的价格体系对科技园区市场带来困惑。比如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园区,园区租赁价格低于成本价,但企业投资建设的园区因为成本关系,不可能提供如此低的租赁价格。不公平的科技园区竞争环境,不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参与科技园区开发建设。因此,政府投资的科技园区与企业市场化的科技园区的定位应该有所区别。政府科技园区应该定位为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公共技术服务机构等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机构提供产业用房,以及为少数特别需要政府扶持的产业链空白、缺失环节而且暂时无法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提供产业用房。至于普遍性科技企业的房租补贴,行业主管部门应该面对所有类型的科技园区,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条件。这样,既能突出基础研究及重大项目能够得到政府的最大支持和保障,又能构建更好的市场化公平竞争环境。

(四) 需要鼓励专业化统筹运营。科技园区运营是一项专业工作,所以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园区专业运营。有效组织资源配置必须以高端科技园区为核心,建立科技园区产业生态合作体系。理论上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都具备牵头建立园区生态体系的资源条件。但如果建立这样的平行生态系统,则这几个系统之间应该建立起充分合作的机制,使园区生态体系具备升级为中国产业生态体系的条件。而对于其他城市的科技园区平台来说,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好应该充分融入的一线城市园区生态体系,并以专业产业运营的理念来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通过这个宏大的园区生态体系获取更多更好的创新资源,也帮助自身园区企业在这个生态体系中获得更多市场机会。

六、以产业生态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对深圳的发展目标要求非常明确。总的理解,党中央要求深圳作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高质量发展,除具体

目标之外，还可以从产业发展阶段角度来理解。在前文对湾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深圳目前主要处于科技产业发展阶段，更高的阶段为现代服务业阶段和创新经济阶段。创新经济阶段可能是深圳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体现，因为在以金融为核心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显然代表性更强、地位更加重要。但在科技产业创新方面，创新经济是产业发展的最高阶段。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党中央对深圳高质量发展寄予厚望。但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与现有发展方式有本质的区别。从熵增定律来看，如果以传统方式来实现增长，实际上是一种熵增模式；如果倒逼深圳以现有条件实现更大增长，虽然有阵痛，但它却是帮深圳做最有价值的熵减。

（一）积极为科技产业升级赋能。科技创新是深圳的优势，但这种优势还停留在相对优势，即相对于内地省市的优势。如果从全球产业竞争力格局来看，深圳并不具备太强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原始技术创新方面还存在短板，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大。今后应更加支持深圳企业创新发展，朝创新经济阶段迈进。比如在积极发展基础研究机构、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等高端科研机构的基础上，可通过以市场化方式建立类似于以色列维兹曼研究院的技术许可机构——耶达技术转移公司这样的专业机构，使研发机构的核心技术、专利成果能与深圳科技企业的技术攻关和许可使用建立有效、有机的融合，帮助科技企业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在支持深圳企业提升技术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构建产业生态科技园区体系来建立更紧密地区协同的方式帮助深圳企业克服以往单打独斗的不足，使企业能更快更好地进行全国乃至全球业务与市场的布局，做大做强。总的来说，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圳经济、产业发展除良好的产业导向外，支持发展的模式、重点、政策都应该根据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作出及时的调整和优化，而不能固守已有的模式。此外，在科技产业支持政策方面，应作出较大的调整，重点支持核心技术创新及非共识创新；在支持方式方面，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减少普惠方式，提升产业政策的成效。

（二）抓住机会发展现代服务业。从深圳的产业发展阶段来看，应处于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化之间的阶段，也因此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可以认为这种担忧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应该成为深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障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本质来自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等需求，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是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尤其在后工业化社会时代，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业等进一步发展，科研、信息、教育等现代知识型服务业崛起为主流业态，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而且，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是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服务。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应融合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格局中，深圳应该将服务大湾区制造业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大好机会，实现深圳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跨越式提升，亦即更高质量的发展。从湾区产业发展阶段规律来看，这也是一条必经之路。

（三）支持企业家引进与培育。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但企业家又是特有的物种，无法靠培训获得。重视企业家的引进与培育，首先要为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同时需要改变思维，变想要支持企业家创新为理解企业家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并去实现它。华为实际上为全社会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创办的企业，真正的企业家能为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价值。其次，应该制定专门的企业家支持政策，将企业家作为特殊的特殊人才予以特别的保护和特别的支持。同时，深圳应该吸引更多真正的企业家来深圳创业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招引企业落户深圳。企业家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企业家的集聚性也代表了深圳是否能够跨入一个更高的产业发展阶段。

（四）推动人才政策创新。人才永远是创新的核心。深圳吸引人才、引进人才力度很大，成效显著。不过，随着深圳向创新经济方向迈进，带来了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人才政策也应进一步优化。有企业家提出，应该对人才的认定标准及

支持政策进行调整,将创造价值设定为人才认定的核心标准。首先,深圳可率先建立一套区别于机关事业单位及科研机构的企业人才认定和支持专门标准,更精准地支持与吸引创造价值的企业员工;其次,要将人才政策从对人才的学历、学术条件和以往成绩的认定转向对人才现在和未来对深圳创造的价值的鼓励与肯定;应再次将人才资源配置权力下放给企业,比如对经认定的深圳核心企业,可以将深圳户口入户、国外境外人才引进审批、出入境手续办理等权限有条件地委托重点企业自主行使,充分体现深圳广纳海内外英才的胸襟与魄力等。

(五)支持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科技园区的创新发展,对深圳有三个方面的价值:首先是集约化利用土地的价值,这一点与新加坡高度类似,深圳如果在人均GDP上要追赶新加坡,必须在土地集约利用上下大功夫,而深圳高新区及深圳湾科技园区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集约利用土地的潜力;其次,科技园区所形成的产业资源平台是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部门非常愿意支持企业发展,但无法将服务及资源有效全面覆盖到所有的企业,而个体的企业又苦于自身资源渠道限制使企业发展受到局限,因此科技园区所形成的产业资源平台完全可以作为政府产业政策与市场化产业资源结合起来共同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平台,成为深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最后,科技园区产业资源平台又将形成创新的商业模式,当前主要的互联网平台都是民营企业主导的平台,商业化属性过强导致问题层出不穷,也无法完全吻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及方向,如果支持建立国有科技园区平台的全新商业模式,将对深圳的创新示范具有重要的价值。总的来说,支持科技园区的创新发展,对深圳的高质量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2] 罗素著.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3]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5] 德布拉吉·瑞著.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叶初升.中国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N].光明日报,2019-11-01,(11).

[7] 丁伟,陈海燕主编.华为之焔光明之矢[M].深圳:华为大学,2019.

[8] 曾振木著.心耘[M].戴至中,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9] 李光耀著.李光耀观天下[M].新加坡:海峡时报出版社,2014.

[10] 维克多·黄,格雷格·霍洛维茨著.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11] 陈宪著.创业创新:中国经济转型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2] 葛培建,宋振庆,沈斌著.园区中国7:产业地产操盘实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3] 王爱君.发展经济学研究三十年回顾[N].光明日报,2008-10-07(10).

[14] 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思想发展与流派渊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邱文,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中国鲲鹏产业源头创新中心联席主席

责任编辑:毛军吉